

# 党组织嵌入、审计监督与预算松弛

——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代彬<sup>a,b</sup>, 谈星辰<sup>a</sup>, 刘怡<sup>b</sup>

(四川外国语大学 a. 国际商学院; b. 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摘要:** 预算管理是企业管理控制活动的重要构成,也容易成为企业高管自利行为的“良好载体”,而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则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抓手。基于2010—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能够降低国企高管的预算松弛程度,并且党组织嵌入程度越深其对预算松弛行为的治理作用越好。“国际四大”通过强化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行为的抑制效应展现出协同治理功效,而审计师行业专长则发挥了相对消极的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行为的遏制效果在中央企业以及随着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表现更佳,但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尚未带来治理功效的相应增强。研究不但有助于厘清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具体路径,还完善了对制度转型情境下企业预算松弛行为的理论认知,并为理解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耦合机制提供了经验启示。

**关键词:** 国有企业; 党组织嵌入; 审计监督; 预算松弛

中图分类号: F27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4543(2020)06-0064-16

DOI:10.16537/j.cnki.jynufe.000598

## 一、引言

与西方的公司治理体系大相径庭,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制度设计上极富“中国特色”,其中的关键举措就是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2017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提出国有企业应“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习总书记讲话和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既为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建设指明了原则方向,也为相关问题的跟进探索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推进党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已成为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sup>。

现有关于国有企业党组织作用方面的文献,大部分研究证实了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功效,诸如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sup>[2]</sup>、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sup>[3]</sup>、约束高管隐性腐败<sup>[4]</sup>、优化企业投资效率<sup>[5]</sup>以及缓和企业激进避税<sup>[6]</sup>等。不过,也有少量研究发现党组织治理可能蕴含一定程度的政治

收稿日期: 2020-04-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党组织嵌入视阈下的国有企业非伦理行为及其治理机制研究”(19BGL059)

作者简介: 代彬(1982-),男,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国际投融资;谈星辰(1996-),女,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刘怡(1979-),女,湖南辰溪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财务与会计、财务审计。

成本,例如对负面信息的管控降低了企业透明度<sup>[7]</sup>、增加了企业的冗余雇员<sup>[8]</sup>等。上述研究揭示,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及行为表现有显著影响,其效应是多方面的且具有复杂性。

区别于以往文献,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国企基层党组织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预算松弛行为。之所以从预算松弛的角度进行分析,是考虑到国有企业党组织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能否对企业决策起好监督与调控作用<sup>[9]</sup>。而所谓预算松弛,是指预算编制责任人在制定预算任务时,有意地利用高估成本、低估收入等方式降低预算目标实现难度的机会主义行为。预算松弛问题既是管理层利益攫取的私欲膨胀使然,也是公司预算管理“失灵”的直接表现<sup>[10]</sup>。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相对较短,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法规也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监督追责机制的薄弱和失调侵蚀了对高管以权谋私行为的威慑效力<sup>[11]</sup>。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核心支柱和依靠力量。遏制预算松弛行为,需要国有企业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因此,党组织如何创新和有效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进而增强对制度转型情境下预算松弛等寻租行为的治理监管,亟待深入研究和科学论证。

进一步地,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及其效果还取决于与所关联的诸多治理要素的匹配<sup>[12]</sup>。随着我国审计市场的日臻完善,独立审计在公司治理中所具备的监督作用也日渐显现。来自欧美资本市场的大量研究揭示,审计师所“恪尽职守”的鉴证、评价、报告等岗位职责对于缓和公司治理中的道德风险和代理成本贡献良多,从而约束内部人寻租行为,使得外部审计在改善公司治理效率方面被寄予厚望<sup>[13]</sup>。最近十多年来,我国持续推进的诸如鼓励合并、推动转制等多措并举使得外部审计的监督功效日益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更是强调了外部审计在国企监督体系中的作用。不过,一些研究也指出审计师同样可能成为高管谋取私利的“挡箭牌”甚至“合谋者”<sup>[11]67</sup>。那么,在我国当前特有的政党制度视阈下,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监控工具及治理手段”,外部审计能否在抑制高管预算松弛行为方面与国企党组织有效耦合并产生协同治理效应呢?

显然,对上述困惑的探究无疑有助于更好地洞悉基层党组织功效以及夯实高管行为的监督效力,自然也成为本文研究视角的基本出发点。基于2010—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能够降低国企高管的预算松弛程度,并且党组织嵌入程度越深其对预算松弛行为的治理作用越好;不同的外部审计特征(“国际四大”和行业专长)在调节党组织嵌入影响预算松弛的关系上呈现出相对迥异的境况。进一步研究揭示,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行为的遏制效果在中央企业以及随着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表现更佳,但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尚未带来治理功效的相应增强。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主流公司治理理论中有关党组织的作用发挥犹如一个黑箱,尚未得到恰当理解和足够重视<sup>[14]</sup>,而且鲜有研究涉及党组织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寻租行为。本文尝试拓展了有关基层党组织治理的研究视角,为厘清党组织如何施展监督职能并进一步评判其治理效果贡献了鲜活素材;其次,Okafor和Otalor<sup>[15]</sup>等学者虽然已从预算参与等视角探讨了对预算松弛行为的影响,但总体而言仍缺乏黏合中国本土治理元素的考量。现实世界中内部人寻租行为大都与“嵌入性”治理要素息息相关<sup>[16]</sup>,而本文将我国“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纳入研究范畴,不但有助于理解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具体路径,并且能够丰富企业预算管理领域的研究视野;再者,对于党组织治理作用情景变量的探讨,则有助于更清晰地阐释党组织“嵌入性治理”的内生关联及其效应<sup>[12]8</sup>,而本文发现党组织治理与以外部审计为代表的治理情景要素在预算松弛的协同治理上展现出较强异质性;最后,本文进一步探索了控制层级、分析师关注以及党组织“新鲜血液”流入等因素如何影响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行为的治理,不但为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间交互作用的相关探讨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管理当局的政策制定给予了有益参考。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党组织嵌入与预算松弛行为

已有文献主要从内部控制<sup>[17]</sup>、高管薪酬契约<sup>[18]</sup>、信任机制<sup>[19]</sup>以及预算参与<sup>[15]</sup><sup>106</sup>等多个角度对预算松弛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展开了初步研究。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是,广泛存在的预算松弛行为已扭曲了预算管理的初衷,在恶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往往沦为内部人权力自利的“良好载体”<sup>[18]</sup><sup>96-97</sup>。而要理解我国国有企业内部人寻租行为的本源机理,除了扎根于日臻完善但依然相对低效的传统公司治理情境,更离不开对国企行为决策施加关键影响的政党制度因素<sup>[5]</sup><sup>195-199</sup>。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要更深入地剖析中国共产党在经济转型中的角色,只有“找回政党”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市场化转轨<sup>[14]</sup><sup>54-56</sup>。在这一背景下,党组织治理与企业行为的关系也逐渐受到研究关注。作为国有企业内部的重要部门且处于领导地位,党组织在国企的存在和地位具备厚重且坚实的法理基础<sup>[2]</sup><sup>110</sup>。沿循上述理论逻辑,本文认为党组织嵌入有助于对国企高管的预算松弛行为发挥抑制效应,其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党组织一贯坚持的“党管干部”原则使得党委会能够对预算松弛等高管徇私动机构成制约。《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等多项政策文件中都强调了“党管干部”原则在国企党组织建设中具有总揽全局的基础和核心地位。根据这一原则的要求,国企党委应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选人用人,并强化党委(党组)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在国企高管腐败现象频发、监管机制相对孱弱的现实治理情景下,“党管干部”原则通过严格落实高管选拔、任用、监督等环节上的政治关、品行关与廉洁关,成为国企防范高管信念动摇以及破解“内部人控制”的有效制约力量。现有的相关研究发现,“党管干部”原则给予了国企党组织在高管选聘方面强有力的控制权和充分的话语权<sup>[20]</sup>,在制度上能够形成对高管预算松弛行为的高压态势,并相应地约束企业决策中的高管寻租倾向和腐败行为<sup>[4]</sup><sup>176-177</sup>。另外,我国国企高管兼具“准官员”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并对官员身份有更强倾向性<sup>[21]</sup>。因此,考虑到双重身份聚合下对政治晋升的强烈追求,“党管干部”原则在约束国企高管的预算松弛行为方面可能独具特效。

其次,国企党组织拥有参与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的法定权力。《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中均明确了党组织在国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这为党委将党和国家的意志内化和贯通于企业经营决策事项提供了制度保障,并无形中会将党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渗透并进一步转化为企业的组织行为准则<sup>[1]</sup><sup>27-28</sup>。《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中规定,对涉及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须经党委会研究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后,再由董事会作出决定、经理层实施执行,党组织要对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不符或脱离实际的情况及时进行干预。例如,作为董事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预算管理委员会是企业组织和实施预算管理的最高管理机构,而董事会中的党委会成员可能会扮演政府代言人的角色,在审议预算方案的过程中对其合理性加以特别考量,迫使预算编制责任人打消对预算管理的自利性操纵意图。相关研究也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就越能对公司重大决策产生显著作用<sup>[2]</sup><sup>106</sup>。因此,党组织以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发挥关键影响的方式,能够确保从源头上弱化甚至“扼杀”预算制定中的机会主义动机,从而约束预算松弛行为的发生。

最后,党组织还能通过重塑企业商业伦理、培育企业家精神来促进高管自觉“摒弃”预算松弛等寻租行为。“寻租”关系会对高管伦理认知产生负面影响,而道德品性不佳的CEO将使企业逐渐酿成非伦理性的公司文化(Unethical Corporate Culture),并更可能出现激进避税等权力寻租行为<sup>[11]</sup><sup>67</sup>。相反,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则能促使企业决策更加尊崇伦理准则并更少陷入高管徇私丑闻<sup>[22]</sup>。党性原则与经营智慧兼备是国企高管必有的基本素质。党组织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嵌入国企公司治理体系后,会积极地响应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增强企业道德合法性诉求,这有助于建立起高管团队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与伦理规范。此时预算负责人也可能会感知到组织氛围的微妙变化,实时调整经济利益至上

原则的效用偏好,在决策行为中注重对伦理责任的彰显,对预算松弛等短期行为进行约束。一些研究也证实,党组织在缓和企业内部劳资关系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23]</sup>,并且还通过对企业目标效益导向的纠偏以及依靠价值观的形成和传递提升了社会责任表现<sup>[3]63</sup>。

基于以上分析,这里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H<sub>1</sub>: 党组织嵌入能够抑制国企的预算松弛行为,并且党组织嵌入程度越深其对预算松弛的治理效果越明显。

## (二) 党组织嵌入、审计监督与预算松弛

企业的发展需要自身组织资源与外部环境特征相匹配,外部治理机制也通常成为影响组织内部因素效用发挥的重要变量。诸多研究揭示,独立审计所承担的鉴证、评价、报告等岗位职责对于缓解公司治理中的道德风险和代理成本成效斐然,从而较好的约束了内部人寻租行为<sup>[13]417-419</sup>。不过,代彬等<sup>[11]67</sup>的研究也指出审计师同样可能成为高管谋取私利的“挡箭牌”甚至“合谋者”。那么,具体到本文的研究,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否在治理预算松弛行为方面与国企党组织展现出协同效应呢?

一方面,我国国企权力监管的多元主体已在逐步探索彼此之间的协作与配合。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强调了外部审计在国企监督体系中的作用。国企党委会肩负了“把关定向”的重要职责,不但需要落实政府的相关政策精神以防范制度性风险,也需要引领企业洞悉国家政策导向,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sup>[24]</sup>。出于风险控制等因素的权衡,审计师对客户的决策合规性往往会给予重点关注。而当机会主义行为成为管理层决策的优先选项时,会相应地增加企业违规作假的概率,并可能因审计失败给审计师带来诉讼索赔、监管部门处罚乃至身名俱灭的后果<sup>[25]</sup>。为此,审计师有内在驱动力谨守独立性与专业精神,依靠扩大审计范围及审计程序等举措展现其“外部治理者”的应有作用,进而也降低了管理层、治理层与股东间的代理冲突。而这一点与国企党组织的基本职责也正好契合。

不过与此相对应,随着公司治理情景的日趋复杂,外部审计与党组织的耦合及协同治理效率也可能随之发生相机转换。高管在自利动机驱使下的机会主义行径不但希冀增加私有收益,也会尽力提高党组织和外部审计等监管力量的核查难度,以降低权力寻租的成本和风险。因屡见不鲜的“内部人控制”困局使得企业核心高管往往成为审计师选聘乃至审计收费的关键影响人,也让事务所选聘议题容易陷入高管自利性决策的窘境,致使审计师无法独立自主地形成审计判断,由此可能导致了外部审计难以发挥有效监督<sup>[11]69</sup>。另外,部分党性观念淡薄的党委会成员也可能与党性觉悟背道而驰并扭曲目标利益函数,相反凭借资源滥用、财务侵占等途径谋取私有利益,为隐藏代理问题也有干扰审计师选聘决策的强烈动机<sup>[24]72</sup>,客观上造成党组织与外部审计的耦合关系出现松动。

综上所述,聚焦于外部审计介入情景下党组织对国企预算松弛行为的可能影响,最终展现出何种治理功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组织嵌入与外部审计功效动态博弈及内生耦合的结果。而究竟是体现为高质量审计所带来的叠加效应抑或在“内部人”的牵掣下丧失协同功效,鉴于存在迥然不同的传导机制和阐释方向,使得对确凿关系的梳理并非易事,当前也并无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作为借鉴,主要有待于在实证检验中获得结论。因此,本研究对以上关系并不提前推测可能的结果,转而提出并验证下面的竞争性研究假设:

H<sub>2a</sub>: 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促进党组织嵌入效用的发挥,即外部审计能够强化党组织嵌入对企业预算松弛的抑制作用。

H<sub>2b</sub>: 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不能促进党组织嵌入效用的发挥,即外部审计不能强化党组织嵌入对企业预算松弛的抑制作用。

##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0—2017年沪深两市的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对初始样本按照如下原则

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以及证券行业的样本;(2)剔除ST、ST\*的样本;(3)剔除变量观察值缺失严重的样本。最终本文得到了752个有效观测值。主要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其中有关党组织治理以及企业收入预算数的数据来源于公司年报,并由作者通过手工收集整理而成。为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按照1%和99%分位进行了缩尾处理。

## (二) 变量定义

### 1. 党组织嵌入(PAR)

参考程博等<sup>[24]73</sup>等学者的研究,本文用党委书记是否兼任公司董事长来衡量“交叉任职”程度(PARCHAIR)。同时,还借鉴了马连福等<sup>[8]105</sup>以及余威<sup>[26]</sup>的做法,用党委会与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人员(即董监高)重合的总人数除以董监高的总人数(PARTY)以及党委会与董事会成员重合人数除以董事会人数(PARDIR)两个指标作为“双向进入”指标,用来分别刻画党委会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管层的双向进入程度。

### 2. 预算松弛(SLACK)

之前的同类研究对于预算松弛行为的测度主要是采用李克特量表法,但是该方法的适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卷调查的回复情况以及准确程度,因此受到学者们的较多诟病。为了保证计算结果具有稳健性,本文尝试利用样本企业的年报披露数据来衡量预算松弛行为,并在借鉴潘飞和程明<sup>[27]</sup>以及安灵等<sup>[18]99</sup>研究基础上构建如下的预算松弛度量模型:

$$Slack = 1 - [(I_n^* - I_{n-1}) / I_{n-1} - \hat{I}_{n-1}] \quad (1)$$

其中: $I_n^*$ 表示企业年报中披露的第 $n$ 年预算的营业收入, $I_{n-1}$ 表示企业第 $n-1$ 年实际的营业收入, $\hat{I}_{n-1}$ 表示企业第 $n-1$ 年的行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出的结果,可以对预算松弛情况进行判断。若 $Slack \leq 1$ 则取值为0,表示预算制定偏紧;若 $Slack > 1$ 则取值为1,表示有预算松弛现象存在。

### 3. 审计监督质量(AUDIT)

如何准确有效的度量审计质量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根据“声誉理论”“深口袋理论”和“行业专长溢价”理论,规模较大、品牌价值较高、行业专长较强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通常具有更完善的审计程序、更高效的审计效率和更可靠的独立性,因此展现了相对更高的审计质量,而事务所规模和行业专长也逐渐成为审计质量的“最佳”替代。基于此,首先借鉴代彬等<sup>[11]71</sup>的研究做法,以“国际四大”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替代变量,即若上市公司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则将AUDIT\_4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其次,借鉴刘继红和金佩佩<sup>[28]</sup>等研究的做法,以审计师行业专长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替代变量,并采用市场份额法加以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IMS_{ik} = \sum_{j=1}^J REV_{ikj} / \sum_{i=1}^I \sum_{j=1}^J REV_{ikj} \quad (2)$$

其中,分子为 $i$ 会计师事务所所在 $k$ 行业的客户营业收入总额(REV),分母为 $k$ 行业的所有客户营业收入总额。若 $IMS_{ik} \geq 10\%$ 则将 $i$ 会计师事务所认定为在 $k$ 行业具备行业专长,并将AUDIT\_IMS取值为1,否则为0。

## (三) 模型设计

本文使用如下模型检验党组织嵌入、审计监督与预算松弛之间的关系:

$$SLACK_{it} = \alpha_0 + \alpha_1 PAR_{it} + \alpha_2 GROWTH_{it} + \alpha_3 LD_{it} + \alpha_4 PB_{it} + \alpha_5 BSIZE_{it} + \alpha_6 DOL_{it} + \alpha_7 TURNOVER_{it} + \sum IND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3)$$

$$SLACK_{it} = \alpha_0 + \alpha_1 PAR_{it} + \alpha_2 PAR_{it} \times AUDIT_{it} + \alpha_3 AUDIT_{it} + \alpha_4 GROWTH_{it} + \alpha_5 LD_{it} + \alpha_6 PB_{it} + \alpha_7 BSIZE_{it} + \alpha_8 DOL_{it} + \alpha_9 TURNOVER_{it} + \sum IND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4)$$

在模型(3)和(4)中,自变量SLACK为预算松弛指标;自变量PAR为党组织嵌入指标,包括了“交叉任职”模式(PARCHAIR)和“双向进入”模式(PARTY和PARDIR);AUDIT为审计监督质量的代理变量。借鉴刘浩等<sup>[17]137-138</sup>相关文献做法,在模型中还纳入了以下控制变量:GROWTH(企业成长性)、LD(流动比率)、PB(市值管理)、BSIZE(董事会规模)、DOL(经营杠杆)以及TURNOVER(总资产周转率)等。另外,在模型中也加入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

文中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和计算参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计量一览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或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预算松弛	SLACK	预算松弛程度 $Slack = 1 - [(I_n^* - I_{n-1}) / I_{n-1} - \dot{I}_{n-1}]$
解释变量	党组织嵌入	PARCHAIR	“交叉任职”指标,党委书记如果兼任董事长则取值为1,否则取0
		PARTY	“双向进入”指标,党委会和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重合总人数占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管层总人数的比例
		PARDIR	“双向进入”指标,党委会和董事会重合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
	审计监督	AUDIT_4	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时取值为1,否则为0
		AUDIT_IMS	若会计师事务所所在某行业的客户营业收入总额占该行业全部客户营业收入总额 $\geq 10\%$ 时取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成长性	GROWTH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流动比率	LD	流动资产总额与流动负债总额之比
	市值管理	PB	市净率,每股市价与每股净资产之比
	董事会规模	BSIZE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经营杠杆	DOL	企业的经营杠杆系数
	总资产周转率	TURNOVER	主营业务收入与总资产之比
	年度虚拟变量	YEAR	代表年度固定效应
	行业虚拟变量	IND	代表行业固定效应

#### 四、实证结果

##### (一) 描述性统计

观察表2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SLACK的均值为0.632,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预算松弛问题;PARCHAIR的均值为0.513,即超过一半的国有上市公司中董事长同时也担任了党委书记一职;PARTY和PARDIR的均值分别为0.150和0.191,表明样本期间国有上市公司中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方式内嵌至公司治理已表现出一定的实践基础;AUDIT\_4的均值为0.134,表明聘任“国际四大”作为审计师的样本公司占比仍然较低;AUDIT\_IMS的均值为0.323,表明接近三分之一的事务所被认为具备了审计行业专长。另外,GROWTH的数值说明国有企业正处于蓬勃发展中,但彼此之间成长态势并不均衡。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预算松弛	SLACK	752	0.632	0.483	0.000	1.000	1.000
党组织嵌入	PARCHAIR	752	0.513	0.500	0.000	1.000	1.000
	PARTY	752	0.150	0.114	0.040	0.111	0.556
	PARDIR	752	0.191	0.120	0.000	0.167	0.571
审计监督	AUDIT_4	752	0.134	0.341	0.000	0.000	1.000
	AUDIT_IMS	752	0.323	0.468	0.000	0.000	1.000
成长性	GROWTH	752	0.171	0.417	-0.456	0.088	2.732
流动比率	LD	752	1.421	0.870	0.219	1.217	5.494
市值管理	PB	752	2.455	1.636	0.660	1.979	9.834

表2(续)

变量名称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董事会规模	<i>BSIZE</i>	752	2.222	0.191	1.792	2.197	2.708
经营杠杆	<i>DOL</i>	752	1.629	0.543	1.031	1.473	3.854
总资产周转率	<i>TURNOVER</i>	752	0.744	0.488	0.087	0.617	2.645

## (二) 多元回归分析

1. 党组织嵌入与预算松弛(假设  $H_1$ )

表3报告了党组织嵌入影响预算松弛的回归结果。从回归(1)~回归(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当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后,*PARTY*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且至少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缓解国企的预算松弛行为,并且随着党组织嵌入程度的加强其对预算松弛的抑制效果也越好,表明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行为的确施加了抑制作用。不过,当以*PARCHAIR*和*PARDIR*度量党组织嵌入时其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党组织嵌入的治理功效主要通过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成员的大范围“双向进入”渠道发挥作用。相比之下,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的“交叉任职”方式以及党委会与董事会成员“双向进入”方式对预算松弛行为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约束效果。上述结果也部分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H_1$ 。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的“两职合一”模式进一步巩固了“一把手”的实际控制权,可能导致党组织的民主集中制优势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加之“一把手”可能将注意力更多地配置在投融资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监督职责方面,对高管通过预算松弛等相对隐蔽途径进行的寻租行为没有保持足够洞察力,未能够及时识别并有效遏制;而另一方面,仅在党委会与董事会成员之间建立的“双向进入”渠道所涉及的人员范围也相对较为有限,从而导致党组织“交叉任职”和小范围“双向进入”方式的治理作用发挥有所弱化。上述结果也揭示,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的“两职合一”以及小范围“双向进入”模式可能在实践中仍需对运作机制作进一步完善,党组织治理作用的发挥也应重视组织内部决策权博弈的调整与重构。

就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成长性*GROWTH*和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与预算松弛显著正相关,表明当公司处于快速成长期以及资产运营效率较高时预算松弛程度会普遍攀升;流动比率*LD*与预算松弛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表明营运资本配置状况似乎并不是导致预算松弛发生的重要诱因。

表3 党组织嵌入与预算松弛的回归结果(假设  $H_1$ )

变量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i>PARCHAIR</i>	0.068 (0.62)		
<i>PARTY</i>		-0.946** (-1.98)	
<i>PARDIR</i>			-0.217 (-0.43)
<i>GROWTH</i>	0.923*** (3.16)	0.914*** (3.06)	0.915*** (3.13)
<i>LD</i>	0.087 (1.22)	0.089 (1.26)	0.087 (1.23)
<i>PB</i>	-0.051 (-1.38)	-0.065* (-1.81)	-0.057 (-1.55)

表 3(续)

变量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i>BSIZE</i>	0.063 (0.19)	-0.083 (-0.25)	0.001 (0.01)
<i>DOL</i>	0.134 (1.25)	0.154 (1.39)	0.141 (1.31)
<i>TURNOVER</i>	0.328** (2.33)	0.335** (2.41)	0.336** (2.41)
年度与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 <sup>2</sup>	0.176	0.180	0.176
P 值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752	752	752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z* 值,并经 White 稳健性修正和 Cluster 调整以控制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双尾检验)。下同。

## 2. 党组织嵌入、审计监督与预算松弛(假设 H<sub>2</sub>)

进一步地,表 4 的回归结果报告了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的影响在不同外部审计特征下的异质性变化。从回归(1)~回归(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交乘项 *AUDIT\_4* × *PARTY* 的回归系数为负且至少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以“国际四大”为代表的高质量外部审计进一步强化了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预算松弛的遏制作用,即外部审计监督与党组织嵌入发挥了应有的协同效应,部分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H<sub>2a</sub>。不过从回归(4)~回归(6)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交乘项 *AUDIT\_IMS* × *PARDIR* 的回归系数为正且至少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以审计师行业专长为代表的高质量外部审计反而弱化了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行为的抑制作用。

可以看到,不同的外部审计特征(“国际四大”和行业专长)在调节党组织嵌入影响预算松弛的关系上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境况。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国际四大”可能具备更强的独立性、执业经验和专业判断,对客户在预算管理上的决策合规性给予了必要关注,并通过实施追加审计程序等举措配合党组织治理展现其“外部监督者”的应有作用。相比之下,在我国审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情境下,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可能在国企的预算松弛问题上扮演了类似于“合谋者”的角色,使得外部审计与党组织的耦合机制在“内部人”牵掣下丧失了应有的协同功效。一些研究也指出,出于争夺市场份额等利益动机,审计师可能会妥协其独立性来相机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服务,甚至成为高管攫取私利的“挡箭牌”<sup>[11]67</sup>,此时审计师的行业专长并没有在制约国企预算松弛行为上与党组织发挥出预期的协同效应。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与现有相关研究结论较为吻合,此处不再赘述。

表 4 党组织嵌入、审计监督与预算松弛的回归结果(假设 H<sub>2</sub>)

变量	<i>AUDIT</i> = <i>AUDIT_4</i>			<i>AUDIT</i> = <i>AUDIT_IMS</i>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回归(5)	回归(6)
<i>AUDIT</i>	0.263 (1.31)	0.677** (2.86)	0.475* (1.88)	-0.021 (-0.09)	-0.229 (-1.03)	-0.408** (-2.38)
<i>PARCHAIR</i>	0.052 (0.33)			0.035 (0.17)		
<i>PARCHAIR</i> × <i>AUDIT</i>	0.027 (0.09)			0.106 (0.38)		



表4(续)

变量	AUDIT = AUDIT_4			AUDIT = AUDIT_IMS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回归(5)	回归(6)
PARTY		-0.532 (-0.71)			-1.462* (1.73)	
PARTY × AUDIT		-2.054* (-1.69)			1.756 (1.43)	
PARDIR			0.010 (0.02)			-0.736 (-1.05)
PARDIR × AUDIT			-0.900 (-0.82)			2.331*** (2.66)
GROWTH	0.914*** (4.00)	0.909*** (4.00)	0.912*** (4.02)	0.884*** (3.98)	0.875*** (3.84)	0.887*** (3.78)
LD	0.079 (0.93)	0.087 (1.05)	0.081 (0.98)	0.064 (0.73)	0.058 (0.70)	0.063 (0.78)
PB	-0.042 (-1.21)	-0.055* (-1.66)	-0.047 (-1.48)	-0.047 (-1.28)	-0.059 (-1.60)	-0.046 (-1.37)
BSIZE	0.072 (0.19)	-0.098 (-0.23)	0.017 (0.04)	0.078 (0.22)	-0.031 (-0.07)	0.044 (0.11)
DOL	0.002 (0.02)	0.006 (0.06)	0.001 (0.01)	0.006 (0.06)	0.021 (0.20)	0.013 (0.14)
TURNOVER	0.323** (2.40)	0.312** (2.32)	0.324** (2.40)	0.319** (2.50)	0.308** (2.41)	0.309** (2.38)
年度与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 <sup>2</sup>	0.177	0.182	0.177	0.175	0.180	0.179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752	752	752	752	752	752

### (三) 进一步的研究

前文的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能够较好地抑制国企预算松弛的发生。企业的发展需要自身组织资源与内外部环境特征的有效耦合<sup>[12]</sup>。接下来的疑问自然是,国有企业面临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会对上述关系赋予何种效应呢?结合相关治理实践,本文将主要探讨不同控制层级、分析师关注以及党组织“新鲜血液”流入这几方面因素可能的影响机制。

#### 1. 不同控制层级的影响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权限划分,国有企业可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两种,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探究不同控制层级(中央企业与地方国企)对党组织嵌入与预算松弛关系的调节作用。据此本文构建虚拟变量 *CENTER*,当样本为中央企业时赋值为1,否则为0。

表5提供的检验结果显示,交乘项 *PARDIR* × *CENTER* 的回归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表明相较于地方国企而言,在央企中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的治理效果更好。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央企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试验田,肩负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决策的重大责任,在推进党组织治理落地方面更好地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并且也是率先推动了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治理实践<sup>[29]</sup>。而基层党组织如何更有效地增强对当前治理情境下内部人寻租行为的监管约束,正是央企探路党组织治理的重要议题<sup>[1]29</sup>。因此,央企可能更为重视并完善基层党组织对于企业内部运行机制的实际

影响和持续治理,更加勤勉审慎地发挥了“监督者”功效,在抑制预算松弛行为方面自然成效更佳。

表 5 不同控制层级的影响

变量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i>CENTER</i>	-0.137 (-0.69)	-0.018 (-0.10)	0.250 (1.10)
<i>PARCHAIR</i>	0.078 (0.60)		
<i>PARCHAIR × CENTER</i>	-0.163 (-0.63)		
<i>PARTY</i>		-0.559 (-1.10)	
<i>PARTY × CENTER</i>		-1.288 (-1.19)	
<i>PARDIR</i>			0.412 (0.83)
<i>PARDIR × CENTER</i>			-2.381** (-2.34)
<i>GROWTH</i>	0.895*** (3.05)	0.887*** (2.90)	0.903*** (2.97)
<i>LD</i>	0.099 (1.36)	0.107 (1.46)	0.102 (1.39)
<i>PB</i>	-0.043 (-1.18)	-0.058 (-1.62)	-0.055 (-1.51)
<i>BSIZE</i>	0.069 (0.21)	-0.070 (-0.21)	0.028 (0.08)
<i>DOL</i>	0.151 (1.39)	0.180 (1.60)	0.171 (1.59)
<i>TURNOVER</i>	0.446*** (2.93)	0.462*** (3.11)	0.502*** (3.31)
年度与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 <sup>2</sup>	0.182	0.187	0.187
P 值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752	752	752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z 值,并经 White 稳健性修正和 Cluster 调整以控制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

## 2. 分析师关注的影响

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和信息传递中介,证券分析师往往通过信息渠道与治理渠道来影响公司的财务决策,并被视为扮演着上市公司“监督者”和“施压者”的双重角色<sup>[30]</sup>。为了向资本市场投资者释放好消息,内部人可能会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关注某上市公司的分析师人数越多,意味着该企业信息在资本市场被发掘得越充分,对公司提升治理效率也越有利。为此,本文采用分析师关注人数来衡量分析师关注程度,并构建变量 *ANALYSE*。

表 6 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乘项 *PARCHAIR × ANALYSE* 和 *PARTY × ANALYSE* 的系数均为负且至少

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伴随着外部分析师关注程度的增强,党组织嵌入能够更好的对预算松弛行为发挥应有的监督功效。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证券分析师通常是凭借现场调研、持续跟踪、发布报告等途径,将目标企业的治理情况等信息进行广泛地传递。因此,分析师关注越多,不但党组织成员所能获取的信息就越丰富,更重要的是企业也可能引发更多的市场关注并招揽更多的监督,自然将影响内部人在预算管理决策上的自利性行为。因此,党组织嵌入与分析师在预算松弛问题上能够实现有机耦合并进而发挥出协同功效。

表6 外部分析师关注的影响

变量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i>ANALYSE</i>	0.006 (0.56)	0.013 (1.27)	0.002 (0.18)
<i>PARCHAIR</i>	0.204 (1.32)		
<i>PARCHAIR × ANALYSE</i>	-0.019* (-1.72)		
<i>PARTY</i>		0.031 (0.04)	
<i>PARTY × ANALYSE</i>		-0.097* (-1.92)	
<i>PARDIR</i>			0.041 (0.06)
<i>PARDIR × ANALYSE</i>			-0.027 (-0.54)
<i>GROWTH</i>	0.915*** (3.28)	0.917*** (3.06)	0.914*** (3.09)
<i>LD</i>	0.083 (1.13)	0.096 (1.32)	0.089 (1.24)
<i>PB</i>	-0.054* (-1.65)	-0.066* (-1.79)	-0.058 (-1.56)
<i>BSIZE</i>	0.117 (0.34)	-0.108 (-0.32)	0.036 (0.10)
<i>DOL</i>	0.142 (1.33)	0.150 (1.35)	0.141 (1.31)
<i>TURNOVER</i>	0.481*** (3.29)	0.455*** (2.90)	0.456*** (2.92)
年度与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 <sup>2</sup>	0.183	0.186	0.180
P 值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752	752	752

## 3. 党组织“新鲜血液”的影响

近年来,在中央有关国企改革精神的指引下,各级政府和国企纷纷加大了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进入规模和调整力度,一些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得到稳步提升。本文将这种情况定义为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注入,并据此进一步探讨随着“新鲜血液”的流入,基层党组织对预算松弛行为的治理功效会产生何种变化。本文以 *PARTY* 变量为基准构建虚拟变量 *FRESH*,当样本当年以 *PARTY* 衡量的党组织嵌入程度比前一年度提高时 *FRESH* 赋值为 1,否则为 0。

表 7 提供的检验结果显示,交乘项  $PARCHAIR \times FRESH$ 、 $PARTY \times FRESH$  和  $PARDIR \times FRESH$  的回归系数均没有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的抑制作用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增强。对此可能的原因是,目前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模式实现的党组织嵌入程度提升绝大多数都是源自于对企业内部成员的吸纳,即从企业“内部人”中遴选产生,而从企业外部通过常态化交流制度选派而来的“空降兵”尚为鲜见。对于内部提拔任命的党组成员,原党组织成员对其提名往往有着重要影响,容易构筑起“利益型关系网络”。因此,隐含的“近亲繁殖”属性使得党组织即便有“新鲜血液”的流入,其预期的监督效力也会大打折扣,反而还可能滋生新的代理隐忧。

表 7 党组织“新鲜血液”流入的影响

变量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i>FRESH</i>	0.006 (0.03)	-0.297 (-1.63)	-0.355 (-1.26)
<i>PARCHAIR</i>	0.048 (0.22)		
$PARCHAIR \times FRESH$	-0.020 (-0.06)		
<i>PARTY</i>		-2.021** (-2.48)	
$PARTY \times FRESH$		2.077 (1.38)	
<i>PARDIR</i>			-0.592 (-0.76)
$PARDIR \times FRESH$			1.681 (0.94)
<i>GROWTH</i>	0.862*** (3.85)	0.841*** (3.34)	0.845*** (3.74)
<i>LD</i>	0.061 (0.52)	0.057 (0.51)	0.062 (0.55)
<i>PB</i>	-0.062* (-1.89)	-0.074** (-2.17)	-0.062** (-2.03)
<i>BSIZE</i>	0.307 (1.11)	0.121 (0.42)	0.292 (0.93)
<i>DOL</i>	0.107 (1.43)	0.141* (1.77)	0.118 (1.61)

表7(续)

变量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i>TURNOVER</i>	0.461** (2.56)	0.439** (2.50)	0.472** (2.53)
年度与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i>Adj. R<sup>2</sup></i>	0.194	0.204	0.197
<i>P</i> 值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618	618	618

## (四) 稳健性检验

## 1. 内生性问题

前文在探讨外部审计如何影响党组织嵌入国有企业的治理功效时,一个潜在问题是假设国企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是外生决定的,不过事实上审计师选聘的内生性会使样本存在潜在自我选择性偏误(Self-selection Bias)。例如,党组织嵌入程度更深的国企可能出于传递信号以利于政治晋升、降低内部代理冲突等动机而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等审计大所<sup>[24]</sup>;同时,审计师或许出于“性价比”以及执业风险等因素的考量而对客户特征也有所偏好,由此导致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估计误差。

为此,本文利用 Heckman 二阶段回归法来处理内生性问题。第一阶段为审计师是否“国际四大”的选择模型,并将基于 Probit 模型计算得到的 IMR(Inverse mills ratio)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第二阶段回归。参考程博等<sup>[24]</sup>学者的做法,本文还选择了董监高规模(*LNDSM*)、上市年龄(*LNAGE*)两个变量作为外生性工具变量,其余控制变量与之前模型相同。另外,在 Probit 模型中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AUDIT\_4_{it} = \alpha_0 + \alpha_1 LNDSM_{it} + \alpha_2 LNAGE_{it} + \alpha_3 GROWTH_{it} + \alpha_4 LD_{it} + \alpha_5 PB_{it} + \alpha_6 BSIZE_{it} + \alpha_7 DOL_{it} + \alpha_8 TURNOVER_{it} + \sum IND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5)$$

表8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了自选择效应后,包括 *AUDIT\_4* 变量在内的主要回归结果同表4相比并没有出现实质性差异,即前文的研究受自选择问题的影响可能较为轻微,上述研究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表8 Heckman 两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Probit 模型(因变量 = <i>AUDIT_4</i> )	因变量 = <i>SLACK</i>
	(1)	(2)
<i>AUDIT_4</i>		1.704*** (2.72)
<i>PARTY</i> × <i>AUDIT_4</i>		-2.670* (-1.85)
<i>PARTY</i>		-0.363 (-0.65)
<i>LNDSM</i>	-0.230 (-0.41)	
<i>LNAGE</i>	-0.661*** (-3.99)	

表 8(续)

变量	Probit 模型(因变量 = AUDIT_4)	因变量 = SLACK
	(1)	(2)
<i>GROWTH</i>	-0.824** (-2.49)	0.981*** (2.64)
<i>LD</i>	-0.519*** (-3.49)	0.118 (1.47)
<i>PB</i>	-0.126* (-1.85)	0.033 (0.66)
<i>BSIZE</i>	0.387 (0.65)	-0.373 (-0.94)
<i>DOL</i>	0.129 (0.90)	-0.034 (-0.39)
<i>TURNOVER</i>	0.638** (2.43)	0.073 (0.47)
<i>IMR</i>		-0.548* (-1.89)
年度与行业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752	752

注: 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 t 值( Probit 模型中为 z 值); \*\*\*, \*\*,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 2. 其他稳健性分析

为测试以上结论是否稳健,本文完成了一系列的针对性验证工作:(1)进一步检验党组织嵌入的效用。具体而言,以 *PARTY* 以及 *PARDIR* 两个指标的中位数为标准,将样本分别划分为“党组织嵌入程度高组”与“党组织嵌入程度低组”,然后在分组的基础上对相关模型进行再次检验;(2)更换审计师行业专长的度量方法。借鉴相关研究,以被审计公司的总资产为基础来测度审计师行业专长,然后再对相关模型进行再次检验;(3)调整控制变量的设置。在回归模型中增加公司上市年限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个别指标。总体而言,上述检验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没有出现实质性差异,显示本文的实证结果保持了较好的稳健性。

## 五、结论与启示

实现基层党组织和公司治理体系的嵌入与融合是建立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关键要义。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出台的众多文件均强调要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核心作用,但如何建立高效合理的党组织嵌入性治理体系亟待科学论证。党组织嵌入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国企预算松弛行为?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监控工具及治理手段”,外部审计能否在治理预算松弛行为方面与党组织发挥协同治理效应?国有企业面临的内外部治理环境又会对上述关系赋予何种效应呢?这些议题虽然重要但鲜有文献做深入讨论。

对此,以 2010—2017 年的 A 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发现,党组织嵌入能够降低国企高管的预算松弛行为;不同的外部审计特征(“国际四大”和行业专长)在与党组织嵌入协同治理预算松弛的关系上呈现出异质性结果。进一步研究揭示,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行为的遏制效果在中央企业以及随着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表现更佳,但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尚未带来治理功效的相应增强。本文的研究不但有助于厘清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具体路径,还完善了对制度转型情境

下企业预算松弛行为的理论认知,并为理解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耦合机制提供了经验启示。

本文的研究还具有如下的理论和政策含义:首先,既然党组织嵌入对于国企预算松弛行为能够发挥较好的治理功效,这提示我们基层党组织具有独特价值和积极意义,而实践中如何在《宪法》《公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法规指引下量体裁身地制定相关办法和配套政策则是建立高效科学的党组织嵌入性治理体系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次,研究证实不同的外部审计特征与党组织治理可能展现出相对迥异的协同效果,这表明在继续完善国企审计监督体系的同时,要进一步探索党组织与独立审计等外部社会治理机制的耦合路径,通过政策引导来不断提升两者的协同治理效率;最后,研究揭示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并没有相应地增强党组织嵌入的治理作用。这提示我们党组织治理应更注重实际效果,要避免机械执行或迎合相关要求的形式主义行为,把党委会工作岗位作为培养企业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平台,同时进一步优化国企领导的跨企业双向交流机制,以破除“近亲繁殖”对党组织嵌入可能蕴含的“治理陷阱”。

#### 参考文献:

- [1] 王曙光,冯璐,徐余江.混合所有制改革视野的国有股权、党组织与公司治理[J].改革,2019,(7):27-39.
- [2] 陈仕华,卢昌崇.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能够有效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吗?[J].管理世界,2014,(5):106-120.
- [3] 于连超,张卫国,毕茜.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社会责任[J].财经论丛,2019,(4):61-70.
- [4] 严若森,史林山.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176-190.
- [5] Li X, Chan K C, Ma H. Communist Party Direct Control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20, 27(2):195-217.
- [6] 李明辉,刘笑霞,程海艳.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J].财经研究,2020,(3):49-64.
- [7] Piotroski J D, Wong T J, Zhang T. Political Incentives to Suppress Negative 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5, 53(2):405-459.
- [8] 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冗余雇员与高管薪酬契约[J].管理世界,2013,(5):100-115.
- [9] 吴秋生,王少华.党组织治理参与程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基于国有企业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5):50-58.
- [10] Daumoser C, Hirsch B, Sohn M. Honesty in Budgeting: A Review of Morality and Control Aspects in the Budgetary Slack Literatur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Control, 2018, 29(2):115-159.
- [11] 代彬,彭程,刘星.高管控制权、审计监督与激进避税行为[J].经济管理,2016,(3):67-79.
- [12] 黄文锋,张建琦,黄亮.国有企业董事会党组织治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公司绩效[J].经济管理,2017,(3):6-20.
- [13] Zang Y, Choi S, Kim S. The Effects of Auditor Characteristics on Audit Qua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Enforcement of Sarbanes-Oxley Act[J]. Global Economic Review, 2015, 41(1):417-422.
- [14] Brødsgaard K E, Li X. SOE Reform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4, 31(2):54-78.
- [15] Okafor C, Otolor J. Budget Participation and Budgetary Slack: Evidence from Quoted Firms in Niger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18, 7(2):106-118.
- [16] Yin J, Quazi A. Business Ethics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search[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8, 150(3):815-835.
- [17] 刘浩,许楠,时淑慧.内部控制的“双刃剑”作用——基于预算执行与预算松弛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5,(12):130-145.
- [18] 安灵,赵婷,易丹青.股权结构、高管薪酬粘性与预算松弛[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2):95-103.
- [19] Gago-Rodríguez S, Naranjo-Gil D. Effects of Trust and Distrust on Effort and Budgetary Slack: An Experiment[J]. Management Decision, 2016, 54(8):1908-1928.
- [20] Fan J P, Wong T J, Zhang T.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Post-IPO Performance of

- China's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J].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2014 26(3): 85-95.
- [21] 代彬,彭程,刘星. 金字塔控制、高管政治晋升与地方国企避税行为[J]. 当代经济科学 2017 (4): 105-116.
- [22] Aras G,Williams P. Agency Theory: Explaining or Creating Problems? Good Governance and Ethical Behavior for Sustainable Business[J]. Corporate Behavior and Sustainability 2016 (1): 27-38.
- [23] Lu J, Li M. How do Party Organizations'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s Control Worker Unrest? A Case Study on a Chinese Resource-based State-owned Enterprise[J]. Employee Relations 2017 39(2): 184-203.
- [24] 程博,宣扬,潘飞.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信号传递效应——基于审计师选择的分析[J]. 财经研究 2017 (3): 69-80.
- [25] Bryan D B, Mason T W. Executive Tournament Incentives and Audit Fees[J]. Advances in Accounting 2017 37(C): 30-45.
- [26] 余威. 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民营企业更“乐善好施”吗? ——基于慈善捐赠视角的实证检验[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9 (1): 69-87.
- [27] 潘飞,程明. 预算松弛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财经研究 2007 (6): 55-66.
- [28] 刘继红,金佩佩. 审计师行业专长与汇率风险[J]. 审计研究 2019 (2): 119-128.
- [29] 吴凌畅. 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进章程——基于央企旗下287家上市公司章程的实证研究[J]. 理论与改革 2019 (3): 143-153.
- [30] 叶陈刚,刘猛. 分析师关注、产权性质与盈余管理路径[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8 (3): 34-43.

责任编辑、校对:王旭

##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Audit Supervision and Budgetary Slack: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DAI Bin<sup>a, b</sup>, TAN Xing-chen<sup>a</sup>, LIU Yi<sup>b</sup>

(*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b.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y,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Budgetary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rporat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ctivities, and it easily becomes the “good carrier” of the self-serving behaviors of senior executives.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to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the “two-way entry and cross appoint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oute for the new round of SOEs reform. Empirical tests based on A-share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17 indicate that the embeddedness of party organization can reduce the degree of budgetary slack of SOEs, and the more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s embedded into SOEs, the better its governance effect on budgetary slack. The “Big Four” shows the effect of synergistic governance by strengthening the restraint effec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on budgetary slack, while the auditor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exerts a relatively negative regulatory effect.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on budgetary slack is better in state-owned key enterprises 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analysts' attention, but the influx of the “fresh blood” from the party organization has not brought about the enhancement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e research not only helps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path of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but also improve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budgetary slack behavior under the context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s empirical inspiration for analyzing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party organization and other governance factors.

**Key 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Audit Supervision; Budgetary Slack